

“湖”字头金名片 (之二)

杨伟民

湖笔

江南清雅,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,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江南地区历代的积淀,其中最直观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书籍的生产与传播。历史上“贾而好儒”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。据不完全统计,宋代有沈思、叶梦得、陈振孙、倪思等13人;元代有杜道坚、赵孟頫等5人;明代有吴琬、茅坤、臧懋循、唐尧巨等12人;清代更有许宗彦、杨凤苞、吴云、陆心源等55人之多。

湖笔是湖州毛笔的简称,又名湖颖,与徽墨、宣纸、端砚并称“文房四宝”,名扬海内外,可谓“湖”字头的第一名片。据明嘉靖《吴兴掌故》,“湖州出笔,工遍海内,制笔皆湖人,其地名善琏村”。湖笔制作在湖州已有2000多年历史,传说因秦国大将蒙恬首创“纳颖于管”而成,故蒙恬被奉为笔祖而建祠受祀。自晋朝之后,湖州笔工辈出,至元代遂成“湖笔”之名,其制作技艺代代相承,至今不绝。据明成化《湖州府志》,元时冯应科、陆元宝善制笔,时人将赵孟頫字、钱舜举画、冯应科笔合称吴兴“三绝”。湖笔选料精细,一般以山羊毛、野兔毛、狼毫、黄鼬尾毛为料;制作更为精湛,形成了选料、盆洗、装套、结头、择笔等120多道工艺,

制作出的湖笔具有尖(笔锋尖利)、齐(修剪整齐)、圆(丰硕圆润)、健(劲健有力)四大特色,被称为湖笔“四德”,故有“湖颖之技甲天下”之美誉。

在现代产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,湖笔作为传统产业,仍然顽强生长,不绝而秀,当代尤以善琏湖笔厂之“双羊”牌、王一品笔庄之“天官”牌等最为有名,成为书画家之爱和馈赠之雅品。新世纪以来,湖州市政府已经举办十一届“湖笔文化节”,以“笔”为媒,以“节”为体,推动湖州经济文化发展。2006年5月20日,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0年,湖州还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、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“中国毛笔之都”称号。



▲湖笔工艺中的水盆作业

湖镜

湖镜又名湖州铜镜,为宋至明清时期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。发展至宋代湖州成为铸造铜镜中心之一,因湖州水质清冽,适于磨镜,加上铸镜工艺日益精湛,所产铜镜品质精良,遂世称湖镜。铸镜店多集中在今仪凤桥一带,其中尤以石家镜最为著名,镜背铸字,如“湖州仪凤桥真正一色铜照子”“湖州石十五真炼铜照子”等,犹今之商品标识。外形多样,有圆形、菱形、八棱

形、葵花形、海棠形等,品种有带柄镜、高镜台等。湖州宋镜是中国铜镜铸造工艺由繁典雅走向简单实用的代表者,是铜镜走向实用化、商业化的转折点,开始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,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宋代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宋代铜镜是古代湖州造产品中,行销覆盖范围最广、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、传世流通量最多的标志性器物。

湖州镜的产量很高,销路甚广。远在四川、广东、内蒙、

吉林、黑龙江等地,也都发现有湖州镜。周边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等地区也经常出土湖州镜。明成化《湖州府志》云:“郡中工人铸镜最得法,世称湖州镜。”湖州的能工巧匠们在继承两宋时期铸造工艺和传统的基础上,对铜镜纹饰进行创新,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尚,使湖州再一次成为全国铸镜中心,并持续影响至清代晚期。

薛家是湖州铸镜世家,明湖州推官谢肇淛编写的《西吴枝乘》云:“镜亦以吴兴为良,

范金固不殊,其水清冽,能发光也,最知名者薛氏。”清代乌程诗人汪尚仁的《四勿斋吟集》中有一首《吴兴竹枝词》是吟诵薛家镜的:“薛家镜子铸来精,仪凤桥头旧有名,石十三郎应自照,照依半面不分明。”说明到清代薛家镜取代石家镜成为湖州铜镜中的翘楚。从宋代的石家到清代的薛家,仪凤桥畔造铜镜已历千年,但随玻璃镜兴起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现已成为各方收藏家青睐之物。

湖版与书船

江南清雅,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,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江南地区历代的积淀,其中最直观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书籍的生产与传播。历史上“贾而好儒”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。据不完全统计,宋代有沈思、叶梦得、陈振孙、倪思等13人;元代有杜道坚、赵孟頫等5人;明代有吴琬、茅坤、臧懋循、唐尧巨等12人;清代更有许宗彦、杨凤苞、吴云、陆心源等55人之多。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、刻书,而且广搜博藏,刊刻珍本、善本,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、刻书事业的繁荣。

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,北宋末《思溪圆觉藏》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。南宋、元、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,尤其是明嘉靖以后,由于书船业的推动,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,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

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。作为湖州刻、贩书业的中心一晟舍、织里一带,本来“向以读书为恒产”,即使穷困的寒士,也“每以馆谷终其身,故夜半书声不绝”。明清两代,湖州雕版印刷业日益兴盛,成为全国印刷出版的三大中心地区之一,特别是明末晟舍凌、闵两大家庭首创套色印刷,并从双色发展到五色,从而占据中国当时印刷业的顶端。其中闵齐伋一生共刊刻35种套色本,成为套印本的最大出版家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云:“余所见当今刻本,苏常为上,金陵次之,杭又次之。近湖刻、歙刻骤精,遂与苏常争价。”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:“金陵、新安、吴兴三地,剞劂之精者,不下宋版。”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,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。

湖州书船,又名织里书船,被誉为“流动的书肆”,在铁路尚未兴起的古代中国,环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网成了运输行业

得天独厚的优势。织里书船就是专门卖书之船,随晟舍雕版印刷业发展而兴起。

书船始于明初,嘉靖至万历年间步入鼎盛阶段,至清朝、民国仍盛行,直至抗日战争爆发,在湖州“兴旺发达”约4个世纪。书船经营范围,大致相当于今之长三角地区。书船载书,浮家泛宅,南至钱塘,东抵松江,北达京口,出入于士大夫之门。所到之处,常得主人礼遇,客之末座,号称书客、书友。他们袖笼书籍,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,售书图利。据清朝同治《湖州府志》载:“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、谈港诸村落。”乾隆谕旨里特别提到湖州书船:“湖州向多贾客书船,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,与藏书家往来最熟。”路工《访书见闻录》中说:“湖州一带贩书商人,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。”清戴璐《吴兴诗话》等笔记小说提到,明嘉靖、万历后,随着书船业的兴旺,除书船能直接抵

达的城镇外,远至金陵、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。他们结成销售网络,参与当地书籍出版、销售的竞争,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。“湖州贩书客人”在现实生活中的活跃,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些明清小说中的典型形象。

书船一般置船棚,棚下两侧置书架,陈设书籍。中间设书桌和木椅,供选书者翻阅时用。书商向刻书家趸购书籍,装货出运,一路沿埠相售,任人上船购买。还随时出入官宦、生员、举子之家,出示预备书目传单推销,灵通需求。在卖书之余,还想方设法收购秘卷佚本,转售于雕刻家刊印。不仅双方得利,而且推动了刻书和贩书业的发展,也为藏书家藏书起中介、流通作用。陆心源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序谓:“太湖有书船,夙善聚书。兵后(太平天国运动后)我得于书船者,尚不下数万卷。”时居苏州的德清学者俞樾曾作诗说:“湖贾书客各乘舟,一棹烟波贩图史。”

北宋
航海
铜镜



香港中文大学
文物馆展出的“湖州石家念二叔”反文花鸟镜,宋代(11-13世纪)



扫一扫 查看更多内容